

# 1871年阿古柏伯克与清朝交涉始末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4-06-26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新免, 康, 小沼, 孝博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88">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88</a>

# 1871年阿古柏伯克与清朝交涉始末<sup>1)</sup>

新免 康、小沼 孝博

## 前言

1864年（同治三），在新疆爆发了穆斯林居民的大规模叛乱，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清朝在当地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趁着这个混乱局面，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伯克（Muhammad Ya'qub Beg，穆罕默德雅库布伯克，1820?-77）侵入了新疆。1865年来到喀什噶尔后，阿古柏逐渐对周边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倒各个势力，于1867年（同治六）压制了天山南路全部地方。接着，1870年（同治九），他侵占由东干（回民）<sup>2)</sup>势力控制的吐鲁番、乌鲁木齐，保有了新疆领域的大部分。对此，清朝政府根据左宗棠（1812-85）的建议，决定武力收复新疆。在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迫近的情况下，1877年（光緒三）春阿古柏突然死亡。<sup>3)</sup> 收复新疆后，清朝于1884年（光緒十）建立新疆省，进行统治体制的再编。这一系列事件在清末历史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阿古柏曾与俄罗斯、英属印度及奥斯曼朝建立的关系，其交涉过程和内容已基本阐明。<sup>4)</sup> 而至于他与清朝的关系，我们的了解几乎只限于1877年清军进攻时期在英国政府调停下于伦敦举行的谈判。<sup>5)</sup> 但应当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学者A. 霍加耶夫基于清朝史料中的记载，关注到了第一次乌鲁木齐远征（1870）后不久，阿古柏曾向清朝发出信函的问题。他又说，这件信函的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阿古柏以此与北京政府进入交涉，试图争取到清朝政府对他们政权的承认。<sup>6)</sup>

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调查，笔者确认了该院所藏的一件察哈台语文书（《军机处折件》107186）即是曾认为已不存在的阿古柏送给清朝同治帝（于1861-75在位）的信函原件。并且国立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与这件信函有关联的其它清朝档案史料，根据对这些史料的分析，查明了有关1871年前半年阿古柏与清朝接触的新事实。本文介绍该文书的内容，同时对清朝接到信函后的处理问题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此探讨阿古柏与清朝关系鲜为人所知的一面。

## 一、历史背景

将该文书（以下简称“阿古柏文书”）送给清朝的1871年初，正当阿古柏刚刚抢占吐鲁番、乌鲁木齐之后。在阿古柏的“东方远征”之前，称为“清真王”（Khalifa）的妥得璘（或妥明）与称为“大元师”的索焕章，及马仲（或马忠）等所领的东干势力盘据在吐鲁番、乌鲁木齐，清朝仅仅保有哈密、巴里坤两地。1869年初，清朝政府为了侦探情况，将委任遊擊梅振清与哈密委员乌仁泰、柴福<sup>7)</sup> 等一同派遣至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到了吐鲁番后，梅振清停留在该地，而乌仁泰和柴福根据妥得璘的指示前赴乌鲁木齐。被分散的他

1) 本文系已经发表过的英语论文“First Contact between Ya'qub Beg and the Qing: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1871”（《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84号，第5-37页，2012年9月）概括翻译而成。

2) 清代自陕甘地区迁移到新疆的回民（即现在的回族），他们被当地突厥系穆斯林居民（现在的维吾尔族）称为“Tungan/Dungan”（东干）。

3) 关于阿古柏的死因，详见白海提：《关于阿古柏的死因：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作者商榷》（刊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0-87页）。

4) Kim Hodong,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8-158.

5) Immanuel C. Y. Hsü, “British mediation of China's war with Yaqub Beg, 1877,”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9 (2): pp. 142-149, 1964.

6) A. Ходжаев,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Джунгария и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 p. 54.

7) 在本文第三章引用的“谕帖”中记为“柴福伯克”。总觉得他为哈密的穆斯林官员，但详情不明。

们，分别在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受到监禁。<sup>8)</sup>

1870年春，发生了吐鲁番的两万东干人突然侵入库尔勒，驱散该地阿古柏驻军的事件。东干势力又向西进攻，在库车进行掠夺后撤退了。<sup>9)</sup>为了应对这件事，阿古柏于1870年3月11日由喀什噶尔出发。到阿克苏时，他得知东干撤退的消息，接着自己率师朝吐鲁番而去。

按照当时在吐鲁番城内的梅振清的描述，索焕章和马仲为吐鲁番东干人的首领。经不断反复的战斗，阿古柏军队围攻半年之后，吐鲁番东干势力最终于1870年11月投降。索焕章出城后，不到两天就病死了。<sup>10)</sup>另外，据说以南山为据点的汉人团练领导人徐学功，当时来到吐鲁番恳请归顺阿古柏，并提供了大量的家畜和粮食等东西。<sup>11)</sup>

接着，阿古柏掉转头来攻打乌鲁木齐。最后，乌鲁木齐的东干首领妥得麟表示投诚进贡，阿古柏接受了其要求。<sup>12)</sup>阿古柏在乌鲁木齐待了三个月之后，又返回吐鲁番停留了两个月，1871年4月初离开吐鲁番去往阿克苏。

在这次东征过程中，阿古柏得知了监禁在吐鲁番、乌鲁木齐的清朝官员的存在。据梅振清所说，阿古柏的“管事头目”玉苏罕(<Yūsuf Khān?)<sup>13)</sup>于同治十年正月初旬(1871/2/19~28)来到他那里，告知了阿古柏准许他返回及给清朝寄送书信的事。梅振清在正月十一日(1871/3/1)离开吐鲁番，其后到达鲁克沁时，阿古柏的书信果然到来。<sup>14)</sup>此书信就是本文考察的对象“阿古柏文书”。正月二十二日(1871/3/12)，梅振清带着此信，时隔两年后返回了哈密。<sup>15)</sup>其后，清政府颂扬他面对敌人英勇不屈的忠义，赐予副将衔。<sup>16)</sup>监禁在乌鲁木齐的乌仁泰和柴福也被释放，于二月七日(1871/3/27)到达哈密。<sup>17)</sup>

## 二、文书的翻译与特征

### (1) 文书的翻译

“阿古柏文书”长纵440mm，宽260mm，表面有20行本文，背面右下盖着阿古柏本人的印章。语言是察哈台文，没有写日期。收信人为当时的清朝皇帝(秦可汗/Khāqān-i Chīn)，即同治皇帝。以下揭示拉丁字转写与译文

- 
- 8)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折件〉107187 : ff. 2-3,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1871/4/13], 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的奏折;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卷二百四十二 : 15a-b,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1871/6/11] 条; 《方略》卷二百四十五 : 10a, 同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1871/7/11] 条。
- 9) Mullā Musā Sayrāmī, *Tārīkh-i hamīdī* (Lund University Library, Jarring Collection, Prov. 163, 以下简称TH/J), ff. 86b-87a ; Mulla Musa Sayrami, *Tarīkhī hāmīdī* (Nāshrga tāyyarlighuchi: Ānwār Baytur, Beijing: Millātīlar Nāshriyati, 1988, 以下简称TH/Ā), pp. 433-435 ; *Таарих-и эмэни: исторія владѣтелей Кашгаріи* (сочиненіе Муллы Мусы бенъ Мулла Айсая Сайрамца; изданная Н. Н. Пантусовымъ, Казань: Типографі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05, 以下简称ТА), pp. 194-195.
- 10) 〈军机处折件〉107187 : f. 5.
- 11) TH/J : ff. 89b-90b ; TH/Ā : pp. 445-448 ; ТА : pp. 201-203.
- 12) TH/J : ff. 90b-91b ; TH/Ā : pp. 449-454 ; ТА : pp. 204-207.
- 13) 汉文史料中也记为“玉苏伯克”(<Yūsuf Beg?)。玉苏罕之名在穆斯林文献中没有出现。后年，清朝收复新疆时，乌鲁木齐东干为将清军达到古城的第一消息向阿古柏传达派遣的使者叫“玉苏布伯克雅萨瓦尔巴什”(Yūsuf Beg Yasawul Bash) (TH/Ā : pp. 482), 不知是否与他是一人物。
- 14) 〈军机处折件〉107187 : f. 6.
- 15) 〈军机处折件〉107187 : f. 2 ; 〈军机处折件〉107189 : f. 1 ; 《方略》卷二百四十二 : 14b-15a.
- 16) 《方略》卷二百四十五 : 13a-b.
- 17) 〈军机处折件〉107190 : f. 1 ; 《方略》卷二百四十二 : 17b-18a.

【表面】

- (1) Bismi 'llāhi 'r-rahmāni 'r-rahīm
- (2) Bājīn iqlīmīni bilip igādārlīq qiladurghan Khāqān-i Chīngha,
- (3) bilindūrādurghan uchur. Biz musulmānlarni ulugh kitāblarimizdāki ta'rīkh ḥisābimizda
- (4) bir ming ikki yūz sāksān bir, Khāqān ḥisābida üçhünchi yilidā Nanlūdin Kāshgharni
- (5) Farrāj yerliki oghri Şiddīq buzup igālāp andūh ishlārni qilghan ekān. Bizlārni Khōqand wilāyati-
- (6) ni khāni buyrup Kāshghargha kelip ulugh khudāni amr-farmāni birlān u yerlārgha
- (7) igā bolup turghanimizda, bu taraf Khotan Aqsu Ush Kuchar qatārlīk yerlārnu
- (8) fuqarālari birlā qolumizda amānlīk tafip tīnch kōngül awqāt qilip yūrūp
- (9) edi. Toqquzunchi yildā Ṭurfan Khamyūza ichidāki ghalaba chiqarip yurt buzghan ānsiz
- (10) Tūngānlar “Nanlūgha baramiz.” dep kōngli buzulup Kucharghacha barghanida, cherik aṭlandurup Ṭurfangha kelip
- (11) Ṭurfanni taskhīr qilip mundāki yamanlarni adabini berip Ürümchighamu barip hammasini
- (12) tābī' qilip, bu aradāki andūh Tūngānlar khudā ta'ālāni iltifāti bilā tāza jazāsini kōrdi.
- (13) Munda ichkārīdin chiqip Tūngānlarni qolida tutulup qalghan maṣṣabdārlar bar ekān.
- (14) Aldurup chiqip baqturup edük. Ürümchidin yanip kelip bu üç maṣṣabdārni
- (15) “Yakhshi saqayip qalghan ekān. Mundāki ötkān gāp-sözlārni
- (16) yetkürüp salāmatlikimizni bildürüp āsānlīk sorasun.” dep
- (17) yandurdük. Khāqān bolsa dawlati qalin. Musulmānlar bolsa khudāwand-i karīm
- (18) zamīn u āsmāni yaratip āfarīda qilghan khudādin bölāk pusht-
- (19) panāhi yoq. Ḥali bolsa muncha ishlārnu ulugh khudāni iltifāti birlā
- (20) bolup turadur. Kirgānlārnu yetip kirip ma'lūm qilur, bildürür.

【背面】

{muhr} 1284

Muḥammad Ya'qūb

【表面】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致治理、领有北京之国的秦的可汗。

为 [将如下所述] 呈明之书。按照我们穆斯林伟大书籍 (= 古兰经) 上的我方年历系1281年, 按照可汗年历系第三年 (= 同治三年), 法拉吉 (Farrāj) 地方匪贼斯底克<sup>18)</sup> 变乱占领南路喀什噶尔, 干了凄惨的行为。[奉] 我们浩罕地方的汗<sup>19)</sup> 命令我们前往喀什噶尔, 奉伟大真主之命领有了这里的诸多地方。在此情况下, 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处及其民众, 用我们的手找到了安宁, 过上了安乐的日子。[同治] 九年, [东干人] 于吐鲁番、红庙子 (= 乌鲁木齐) 等处赢得胜利和扰乱地方 [后], 不安分守己的东干人说: “我们到南路去!”, 以此企图干坏事。[东干人] 来到库车后, [我们] 出兵前往吐鲁番, 并征服吐鲁番, 惩罚了那里的坏人。还前往乌鲁木齐, 将其全部收服。[与此同时] 在那里的可怜的东干人在崇高真主的恩惠下再次被处罚。那里有从前由内 [地] 过来而被东干人抓获的 [清朝] 官员。我们 [将他们] 释放并

18) 这个“斯底克”指在阿古柏到来之前掌握喀什噶尔实权的柯尔克孜头目斯底克伯克 (Şiddīq Beg)。在清朝统治下, 他曾为Farrāsh (喀什噶尔地区的一个村庄) 的阿奇木。详见Hamada Masami, “L'Histoire de Hotan de Muḥammad A'lam (III): Commentaires avec deux appendices” (ZINBU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18), p. 75.

19) 据其实说, 令阿古柏到喀什噶尔方面的派遣者并非浩罕汗, 而是当时掌握汗国政权的阿里木库里 ('Alim Quli)。详见T. K. Beisembiev, *The Life of 'Alimqul: A Native Chronicl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entral Asia: Mulla Muhammad Yunus Djan Shighavul Dadkhah Tashkandi*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69–70.

给与照顾。由乌鲁木齐返回〔吐鲁番〕后，我们〔向他们〕说道：“〔你们〕十分恢复了。你们要禀报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及我们的安好，且请〔秦可汗的〕平安”，而让他们三位官员<sup>20)</sup>回去。可汗，您的国家很厚重。除了伟大的真主，即创造天地的真主之外，穆斯林没有依靠。目前，〔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也都是在大真主的恩惠下出现的。入境的人（=三名清朝官员）到达〔那边〕后，自会〔将所有情形〕详禀。

#### 【背面】

1284 [年] <sup>21)</sup>

穆罕默德·雅庫布

#### (2) 文书的价值与意图

仅据笔者所知，除该文书以外，至今还未找到阿古柏送交书信给清朝的记载。目前，我们可以说这件“阿古柏文书”是阿古柏致给清朝的唯一的公式书简。为此，与“阿古柏文书”相关的清朝档案，是反映阿古柏与清朝直接接触之际的交涉过程的珍贵史料。

该文书中，除了清朝官员的保护和遣送之外，阿古柏亲自在说明他怎样侵占新疆及加以统治的简略经过。值得关注的是，他认为征服天山南路、击破东干势力、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以及释放清朝官吏等一连串的事情，都是在超越人类智慧范围的“真主的恩惠”下达成的一点。即该文书的要点在于，阿古柏面对清朝皇帝从穆斯林的观点在表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 三、清朝的对应

#### (1) 文书的汉译

以下在清朝对应方面进行考察。梅振清在1871年3月12日回到哈密，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立即通过哈密亲王麾下一名“通晓清语（满语）”的穆斯林之手，作了“阿古柏文书”的汉译。<sup>22)</sup>兹出示其汉译文。

弹压八城<sup>23)</sup>，为呈明事。本回一千二百八十一年，系大清同治三年，南路回匪斯底克变乱，奉霍罕差派，前往喀什噶尔，祝天保佑，将众人收复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处，安逸如常。九年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处汉回变乱，向南路逃窜，起意盘据库车，当即带兵，剿灭贼匪，克服吐鲁番，由吐鲁番起程，攻击乌鲁木齐。现已至乌鲁木齐，将汉回大加惩创，亦有擒获，贼势穷蹙。从前赴乌鲁木齐官员，现在已回吐鲁番。将始终缘由业经告知梅大人。伏思大皇帝福厚，回等亦是良民，惟望地方宁静，均受雨露之恩。伏思此事皆系天意。所有情形，梅大人自能细禀。<sup>24)</sup>

与原文比起来，汉译文虽有省略、意译的部分，或反之补充的部分，但抓住了基本文意。不过我们要注意到，“阿古柏文书”说明阿古柏的侵占和统治在“真主的恩惠”下而成的这部分，在汉译文中译为他行为都系“天意”。

伊斯兰教的唯一绝对神安拉（即真主）及与其有关的事态，在传统的中华（汉字）文明圈里，多与传统的“天”的字义伴随着表达。<sup>25)</sup>这很可能反映了伊斯兰教的安拉和中华思想的“天”都具有绝对性、普遍性。

20) 这个“三位官员”，或指在吐鲁番的梅振清、在乌鲁木齐的烏仁泰和柴福的三位，或指都在吐鲁番的梅振清、庄义庆、陈兆魁的三位，难以确定。

21) 公历1867年5月5日～1868年4月23日。

22) 《军机处折件》107187：f. 2.

23) 其指天山南路主要八都市，则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西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東四城）。

24) 《军机处折件》107188：f. 1.

25) 举最早一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大食国传）将安拉记为“天神”。

但是，一旦与“天”联系起来，就会被中国的世界观所掌握，“阿古柏文书”也不例外。意思即，在清朝眼里，于“天下”承担“天意”的是作为“天子”的清朝皇帝，穆斯林也只是享受其“雨露之恩”的一个存在而已。<sup>26)</sup>这种基于清朝伦理而对阿古柏行为做出的解释，在下面叙述的“谕帖”里也浓厚地反映出来了。不管怎样，其后清朝的对应方针是基于这一汉译文来商议和决定的。

从书信内容，文麟了解到了阿古柏对清朝有一定恭顺的事情。但书简里一概没有向清朝“投诚交城”的词句。文麟的最大担心再于阿古柏军与已投降的东干势力合谋，企图更进一步侵略东方。这意味着，其背后紧靠回民起义据点——陕甘地区的哈密孤立无援，从而被迫进入非常危险的境地。<sup>27)</sup>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文麟采取了以下三个手段。

(2) 送交“谕帖”

第一，交给阿古柏命其“投诚交城”的“谕帖”，同时以寄送为名试探阿古柏的情况。在此，笔者先提示“谕帖”全文，之后考证其内容。为了方便阅读，基于其内容分段落标注了(a)～(h)编号。

- (a) 谕和阗安集延怕夏知悉。
- (b) 照得本大臣，于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据前差赴吐鲁番等城招安回众委员花翎副将梅振清、随带跟役人等到哈，带来该怕夏回字档子一纸。本大臣当即译汉细阅，内称：“该怕夏，于同治九年因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处汉回变乱，向南路逃窜，盘据库车，当即带兵，剿灭贼匪，收复吐鲁番，复由吐鲁番起程，攻击乌鲁木齐。现已至乌鲁木齐，将汉回大加惩创，亦有擒获，贼势穷蹙。从前赴乌鲁木齐官员，现在已回吐鲁番。将始终缘由业经告知梅大人转禀”，等因前来。
- (c) 本大臣细阅档子。並据梅振清面禀各情，查该怕夏因汉回逆天行事，带兵攻剿，杀贼收城，护救汉官汉民。一心为大皇帝报効出力，深明大义，实堪嘉。尚本大臣一见此信，欢喜不尽。拟即据情，奏请大皇帝破格施恩，将怕夏从优奖励，以酬其劳。一俟钦奉谕旨，即行专差委员赍送吐鲁番，交怕夏恭阅。况我朝廷深恩厚泽，遍被遐迩，无分中外，一视同仁。断不能泯灭怕夏勋功也。
- (d) 再，吐鲁番及南路八城，皆系国家版图。该怕夏既如此知恭顺效命，必能将地方交出。俟呈报来营，以凭本大臣奏请大皇帝，安官设兵。防守俾符旧制，该怕夏等亦得共享升平，各安生理矣。
- (e) 至于乌鲁木齐城池，仍系汉回佔据。本大臣亦即调拨大兵，曾同本地义勇，克期进剿，以靖贼氛。近闻俄国人众，常与安集延回众结仇打仗。邻封不和，亦非正理。今怕夏如此报効恭顺可嘉。一俟大功告，本大臣即行奏明大皇帝谕勅俄国头目，罢兵息战，同归和好。
- (f) 再查，怕夏档子内所说，前往乌鲁木齐委员乌仁泰、柴福伯克、马得成，並跟役人等，已到吐鲁番。仰怕夏将该委员並吐鲁番委员庄义庆、陈兆魁等，令其回哈。以后好与怕夏，来往送信说话以资熟手。
- (g) 再查，梅振清原系钦差乌鲁木齐提督军門成[禄]委员。现已令其进口，与成大人送信去矣。俟该员回哈之日，即令其仍赴吐鲁番，与怕夏送信。第思，梅振清進口，道路穹远，恐其多需時日。茲本大臣先派本营总兵銜副将白世泰带领跟役人等，驰赴吐鲁番，赍送印谕。怕夏亲阅此谕，便知细情。並仰怕夏选派老成能事玉苏伯克一二人随同此次委员先行来哈。本大臣将一切事件面为商明后，即令仍回吐鲁番，断不能扣留一人。怕夏尽管放心，不必疑虑也。
- (h) 余情已囑委员面述，不赘此谕。并怕夏近好。<sup>28)</sup>

一看便知，这一“谕帖”是以比较稳妥的笔锋写出来的，不以阿古柏作为直接谴责的对象。“谕帖”指

26) 有清一代，可看出这样以语言相异为前提的伦理转换。例如，第二代吐鲁番郡王苏赉满纪念其父额敏和卓功修建了陵墓寺庙，现汉语称为“苏公塔”。其堂内立有汉文、察哈台文合璧的石碑，其汉文在宣扬着作为清朝皇帝“旧仆”的郡王一族回报皇帝的“天恩”，但察哈台文却表示着对安拉的谢意。详见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馆，1986年)，225-228页。

27) 《军机处折件》107187：ff. 6-7；《方略》卷二百四十二：16a-17a。

28) 《军机处折件》107189：ff. 1-3。

责抗“天”的东干叛逆者，阿古柏讨伐他们反而应该归就于对“天意”承担者清朝皇帝的“大义”。所以，在清朝一方的观点中，阿古柏的行为重新被解释为对清朝皇帝的功绩（c）。这种理解与左宗棠将阿古柏看作外部侵略者的看法，有相当的距离。

接着说到，目前由阿古柏统治的吐鲁番和南路八城，本来是清朝的“国家版图”，既然讨伐了东干，应该将其土地立刻归还给清朝（d）。这是陈述清朝新疆统治正当性的部分，且与阿古柏所说的基于真主心意的侵占和统治的有效性针锋相对。此外，文麟要求归还被占领地区，恢复清朝原有的统治，为了催促这件事，还传达了清政府为夺回乌鲁木齐而派兵的计划，以及准备劝告俄罗斯停止攻击浩罕的事情（e）。另外，在此“谕帖”中，清楚地表明了新疆为“国家版图”的认识。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割让边疆和划定国境等事，<sup>29)</sup>给清朝“版图”带来比过去更加明确的轮廓，迫使其改变对空间认识的状态。我们从文麟的主张可以了解当时清朝内现实“版图”意识的高涨情况。

关于对阿古柏的存在和行为不加否定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与1877年伦敦议和交涉的结论具有共同方向性。即一方阿古柏承认清朝的宗主权，另一方清朝允许阿古柏对其占领地区的管治。<sup>30)</sup>但“谕帖”并没有言及恢复清朝统治后在其体制中的阿古柏地位问题，这个非常暧昧。收到文麟的奏折后，同治帝（但当年清朝政府的实权在慈禧太后手里）也仅指示，关于“谕帖”中记述的对阿古柏的待遇问题，应明确其具体方法。<sup>31)</sup>本来到这个阶段，清朝与阿古柏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也许对其没有明显的印象。

不过，从后面叙述的部分也看得出，以这次送还官员和书函往来为契机，清朝开始有了与阿古柏接触并保持关系的想法（f-g）。考虑到这一点，寄送“谕帖”的第一目的不是对阿古柏采取具体的措施，而是表明清朝统治的正当性，通过提出几个条件，来试探对方的反应和态度。

### (3) 与团练联合

第二，是与汉人团练的联合。当时，几个团练分布在乌鲁木齐到巴里坤一带，他们将躲避东干动乱的汉人纠集起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踞在南山地区的徐学功麾下的一团，总数有五千余兵。被清朝认为“营官”的团练领导人，<sup>32)</sup>一面继续抵抗东干，另一面有时袭击清朝控制下的村庄，清朝也难于管理。而且，如前所述，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后，徐学功不久接近他，也参加了乌鲁木齐远征，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哈密清朝当局积极推动徐学功等团练加紧联系，以备阿古柏侵略东方。<sup>33)</sup>其实，阿古柏返回天山南路后，徐学功在1871年5-6月间攻打乌鲁木齐。但上述的清朝当局的策略是否对徐学功的这次行动产生了作用，并不明确。

### (4) 与东干联合

第三，摸索与乌鲁木齐东干势力联合。拘留在乌鲁木齐的乌仁泰等官员比梅振清晚15日到了哈密。那时他们将乌鲁木齐东干首领马仲的密书带来了。其中马仲说到：“我等均系大清国子民，何必投顺安集延缠头”，表达了相比于向阿古柏低头还是希望归顺清朝的态度。文麟由其内容判断了马仲“通晓儒理，认识文字、信义”，而且他有“顺汉背夷，同平南疆立功，以赎逆罪”的意志。但因其密书没有妥得璘的签名盖章，无法立刻相信其内容。<sup>34)</sup>于是，文麟为了确认他们的本意，决定再派乌仁泰去乌鲁木齐会见妥得璘、马仲等东干头目。乌仁泰的任务是，如果他们果然归顺，就一同前往驻扎吉木萨尔方面的统领孔才的军营，让他们说明

29) 1871年之前的主要事件有：爱琿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割让给俄罗斯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塔尔巴哈台界约（1864年）割让七河地区；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斯台界约（1869年）割让唐努乌梁海地区西部，等等。

30) Immanuel C. Y. Hsü, "British mediation of China's war with Yaqub Beg, 1877," p. 146.

31) 《方略》卷二百四十二：20a-22a；《穆宗实录》卷三百〇八：17b-19b，同治十年四月甲戌〔1871/6/2〕条。

32) 据俄罗斯史料记载，徐学功带有总管的顶子和双眼孔雀翎。详见“Из Ташкента,”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ост., В. И. Меж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ашкент, 1868-1916), т. 75, p. 75.

33) 《军机处折件》107187：ff. 7-8；《方略》卷二百四十二：17a-b.

34) 《军机处折件》107190，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文麟的奏折；《军机处折件》107191，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文麟致乌仁泰的札文。

众多事件的事由。如果他们又想奔赴哈密正式投诚的话，文麟发给“章程”，然后就让他们回乌鲁木齐去。<sup>35)</sup>

“谕帖”里的文句如实地说明，清朝原来将东干看做“贼”或“匪”，痛斥他们的行为。对于此，这样摸索联合东干势力，与“谕帖”里对阿古柏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这个改变可能是，因阿古柏侵占吐鲁番、乌鲁木齐使文麟等骤然提高了对他们的警惕，其超过了对东干的警惕的结果。但对清朝的这种努力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东干军于1871年5月下旬袭击了昌吉，清朝的态度再度强硬了。<sup>36)</sup>

从以上可知，文麟一面试图寄送写有比较稳妥内容的“谕帖”来弄清阿古柏的态度，但另一面又摸索与团练及东干联合的可能性，采取了防卫措施。

1871年3月28日，文麟将“谕帖”委托参将白世泰寄送出去了。但白世泰到达吐鲁番之前，阿古柏就已离开吐鲁番前往南路了，所以结果“谕帖”没有送到阿古柏的手里。<sup>37)</sup>接到这个报告后，文麟等关于这个“异常”的行动，上奏道阿古柏暗自调兵意图东犯，清廷也判断道“其归顺之说殊不足信”。<sup>38)</sup>结果，1871年前半期的阿古柏与清朝的最初接触，没有发展到连续性的交涉就结束了。此后第二年，镇压陕甘“回民之乱”的左宗棠进驻兰州，开始了接下来收复新疆的准备。

#### 四、结论

1870年，阿古柏侵入吐鲁番、乌鲁木齐等方面，压制那里的东干势力，向东方扩大了占领范围。由此，其与清朝之间的缓冲地带被消灭，双方开始直接接触。在此局面下，1871年初，阿古柏释放并送还了被东干势力囚禁的清朝官员。本文介绍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察哈台语文书，即是阿古柏用这个机会致给清朝的唯一的书函。

在该文书中，面对清朝皇帝阿古柏以超越人类智慧的“真主的恩惠”为理由，说明了自己对清朝旧有领域的侵占和统治的正当性。另一方向，接到书函后，在哈密的清朝当局回送“谕帖”，同时试图联合团练和东干进行防备。这些措施是清朝面对阿古柏的最早的对应。

阿古柏与清朝的最初的正式接触，没有发展到连续性的交涉就结束了。但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阿古柏文书”的存在和内容，以及1871年前半期阿古柏与清朝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清末历史新的一面，十分值得注意。

[附记] 本文是利用日本学术兴振会科学研究补助金(20H01305、20H01331、23H00679、23H00678)完成的研究成果之一。

35) 《军机处折件》107192，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文麟致乌仁泰的札文。

36) 《方略》卷二百五十三：12b-14a，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1871/11/11] 条。

37) 《方略》卷二百五十三：12a。

38) 《方略》卷二百五十三：13a-14a。